



The Impacts on The East Asia's International Order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and-Sea Concept

Hongyi Ji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1078308895@qq.com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Land-Sea Concept not only changes Chinese development patterns, but also determines the way of dealing with external relations.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wer in East Asia. The change of both its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its external behavior deeply influenc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other words,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d-Sea concept has huge and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East Asia's international order. In conclusion, the ancient China focused on land and ignored sea. It sought to maintain a self-centered and negative-peace international order. However, in modern times, China is willing to finis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nd-Sea composite country, meaning that China will take part in the East Asia's regional affairs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contribute to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Keywords: Land-Sea Concept,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Order

中国陆海观念的演变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影响

姜宏毅^①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中国 上海 201620

联系人邮箱: 1078308895@qq.com

摘要:

中国陆海观念的演变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模式, 也间接造成了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行为方式。中国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大国之一, 其内部发展模式和外在行为方式的变化都深刻影响着东亚国际秩序, 也可以说, 中国陆海观念的演变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具体表现为, 古代中国重视陆地轻视海洋, 倾向于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消极和平的国际秩序; 当代中国的目标是建设陆海复合型国家, 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地区事务中, 促进东亚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

关键词: 陆海观念 东亚 国际秩序

1. 引言

从秦朝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开始, 名为“中国”的政治实体的雏形就正式登上了东亚地区的政治舞台。在此后的两千余年时间里, 中国成为了东亚地区最重要的行为体之一, 而且通常是主导地区事务、影响国际秩序的最大变量。“百代都行秦政法”, 秦朝不仅统一了全中国、奠定了此后中国疆域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还留下了一套为此后历代王朝所借鉴的国家发展模式。

这种国家发展模式极端重视陆地而轻视海洋, 而且具有强大的自治性。随着中国历代中央王朝

^① 姜宏毅,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国际政治专业, 博士研究生。电话: +8613561801303, 邮箱: 1078308895@qq.com。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 导师: 陈东晓。



对其不断地套用与改良，这种发展模式越来越成熟，却也越来越排他，尤其是官方在越来越重视陆权的同时又不断地挤压海权的发展，使整个中国陷入一种畸形发展的怪圈，形成一个极端重陆轻海的逻辑闭环，最终只能借助足够强大的外力才能够打破。可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方面叩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随后的西方列强次第入侵，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是另一方面，所谓不破不立，殖民者在客观上也将中国的陆权发展模式强行打破，迫使中国改变传统的陆海观念，寻求新的发展方式。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陆海观念也趋于全面和科学，并结合国情，寻求建设强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

陆海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模式，造就了不同时期中国的国家性质；而中国的国家性质的变化，又决定了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在本地区的事务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陆海观念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东亚国际秩序的风向标。

中国的陆海观念总体上来看是由重陆轻海向海陆并举转变的，这两种观念也分别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发展理念的代表，成为区分古今中国的简单依据。本文主要从陆海观念的演变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及不同发展模式下的中国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影响两部分来说明。

2. 中国古代陆海观念的确立

古代中国无疑是重陆轻海、以陆权为绝对发展核心的，大抵上早期人类文明皆发自大河流域，四大文明古国莫不如此。古埃及之尼罗河，古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古印度的印度河以及中国的长江、黄河，这些大河流域滋养出肥沃的土地，供给人类进行农耕作业，堪称孕育先民们的母亲河。从对河流与土地的依附程度来看，人类社会从早期就带有强烈的陆权属性。但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唯有中国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的传承也具有高度连贯性，并且数千年如一日地维持陆权发展模式不动摇，这必然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土地更加肥沃抑或农耕技术更加成熟，更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幸运”。

实际上，我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古代中国走出了一条以陆权观念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很早就完成了国家统一。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农耕文明时代，国家统一意味着中央政府能够支配大量的人口与社会资源，整个国家因此具备了强大的抗击打能力，或者说更高的容错率，从而在残酷的淘汰中生存下来。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秦国首次终结乱世、完成统一，不仅用其疆域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也将其成功经验刻入了中华民族的基因中。从此以后，几乎每个能够统一中国的中央王朝都遵循了或者说契合了秦国的成功经验，从而逐渐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国家发展模式，我愿将这种发展模式称为“山川”型陆权发展模式。

秦国能够扫灭六国并最终完成绝非偶然，毕竟在先秦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秦国都因地处偏远且国力弱小而在诸侯中处于边缘地位。直到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秦国才得以富强。但实际上，变法的并不止秦国一家，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齐国管仲变法，莫不如此，而且这些在秦国之前厉行变法的诸侯国也确实明显地增强了国力，魏国、楚国和齐国都先后在诸侯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因此，商鞅变法似乎不能够成为秦国成功的根本原因，尤其是，秦国的统一是在变法之后多年才得以实现，其间也并非一直能够对其他诸侯国进行有效的压制，甚至还出现过山东六国“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这样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是事实上，秦国最后成功地克服了此次危机，并且在危机过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统一中国的倒计时。

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六国联军的优势兵力“叩关”时，秦国坚持守住了“关”，才有余力去利用诸侯之间的矛盾来分化、瓦解六国联军；而秦国能够坚守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可以依托函谷关——也就是六国要叩的那个“关”。秦孝公从魏国手中夺取了崤函之地，建立了函谷关，此后函谷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成为了中国东西部的分界线，函谷关以东称为“关东”，以西称为“关西”。由于函谷关依托崤山，因此战国时关东的六个诸侯国也被称为山东六国。在冷兵器时代，山脉天险是国家最好的防御屏障，因此秦国才能够凭借函谷关一夫当关，成功抵御六国的合击，并且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向东出兵，成就统一大业。

贾谊在《过秦论》中开幕雷击：“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随后，“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步步为营，最终“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学者，生活年代和秦朝相近，他的《过秦论》因此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贾谊认为，秦孝公时凭借商鞅变法就能够“窥周室”，也就是说几乎已经具备了统一全国的国力，但还有两个前提条件：“崤函之固”和“雍州之地”。这

[1740]



两点正好对应了前文提到的“山川”型陆权发展模式，“崤函之固”代表“山”，泛指以山地为代表的险要地形；“雍州之地”代表“川”，泛指以大河流域为代表的生产资料腹地。换言之，当一个地方政权有险可守，又有足够的腹地滋养人丁、提供生产资料，就初步具备了统一全国的资格。

秦二世而亡，也许会有人质疑秦朝所谓的“山川”型陆权发展模式只适用于统一全国的过程，而无法在统一之后将国家治理得长治久安。但是，终结秦末乱世、再次统一全国的西汉王朝，其发展模式与秦朝如出一辙。虽然汉高祖刘邦是以汉中为基地，赢得了楚汉争霸的最终胜利，但是他被封作汉中王并非本意，而且和世居关中的秦国贵族统治阶级不同，刘邦出身自典型的关东平民阶层，因此对于关西地区并无特殊感情。汉初的大臣们大多也是关东人，因此极力劝说刘邦定都洛阳，因为洛阳“东面有成皋，西面有崤山、澠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洛水，地势险要，城郭坚固，足以依靠”。

但是同为关东人的张良则劝说刘邦听从娄敬的建议，定都长安。因为洛阳虽然也有险可依，但最大的缺点在于腹地狭小，而且容易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地。而关中东面有崤山、函谷关，西面有陇山、岷山，肥沃的土地方圆千里，南面又有富饶的巴、蜀两郡，北面有利于放牧的胡苑。依靠三面险阻可以固守，只留东方一面控制诸侯。如果诸侯安定，可由黄河、渭河运输天下粮食，往西供给都城；如果诸侯有变，可以顺流而下，足以运输物资。关中之地正是所谓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其实在项羽进军咸阳之后，并非没有劝说其定都关中的声音：“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霸。”可惜项羽没有选择锦衣夜行，最终以楚汉相争的结局再次验证了秦灭六国的成功经验，关中与巴蜀的组合也就成为了“山川”型陆权发展模式最好的具现。定都关中之后，西汉王朝依托山川形胜，击匈奴、通西域、平百越、征朝鲜，无往而不利，开创了百年基业。连司马迁都不由得在《高祖本纪》中承认“故汉兴，承弊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西汉王朝对于“山川”模式的再次成功实践，更增强了其合理性。自此之后，凡是能够统一中国的中央王朝，都是这种陆权发展模式的受益者，“山川”可以说是传统艺能了。

3. “重陆轻海”观念的登峰造极

唐宋之际，随着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江南地区的充分开发，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从关中地区转移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的政治中心也开始追随经济发展的走向，从长安逐渐东迁至洛阳、汴梁和临安。此时，中国传统的陆权发展模式开始产生一定程度的动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同时期的市舶制度以及宋代发达的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的收入甚至一度成为南宋国家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被游牧民族蚕食了大部分北方领土的宋朝和历史上大部分南方政权一样，只能偏安一隅，但是按照海外贸易的趋势，抱守东南半壁的中国似乎就要从以农为本的大陆性国家向贸易立国的海洋型国家转变了。

但是蒙古帝国对南宋的彻底征服，宣告了唐宋之际的转型终究功亏一篑。蒙元帝国征服的脚步不仅打断了中国发展模式转变的进程，还以最直接的方式提醒中国：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是农耕民族永恒的主题。在冷战时期，美国认为苏联“现在对自由制度的进攻是全球性的。在当前权力极化的情况下，自由制度在任何一处的失败就是它在世界各地的失败”。^①同理，对于中华民族这样的农耕民族来说，任何一次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失败都意味着被彻底的奴役。因此，虽然元末农民起义成功地将蒙古人驱逐回漠北，但是明代及之后的中国统治者都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精力用来防止西北游牧民族的再次入侵。明清两代都将首都选在北京，可以说是在权衡了西北内陆的防务压力和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之后做出的最优解。事实上，在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不可避免地背离的情况下，北京确实是作为中国首都的最佳选择：北京本来就是边陲重镇，北方背靠燕山，扼守长城关隘和辽西走廊；往东不远就是渤海，足以遥控东南海疆；往南是广袤的华北平原，足以供养京畿。元朝时将大运河截弯取直，变成今日的京杭大运河，极大地优化了交通往来，运河漕运也就成为了后代朝廷之命脉所系。

可以说，唐宋之际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失败和蒙古帝国入侵带来的巨大恐惧再一次强化了中国陆海观念中的“重陆轻海”色彩。因此在明代初期，中国的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又为了防御倭寇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选择禁海；清代的海禁政策则变本加厉，到了乾隆二十年（1757年），按照朝廷旨意，除粤海关外，撤销其他所有海关，而且“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1, pp. 238-244.



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

唐宋以降直至清末，中国的海外贸易按照市舶一贡市一公行的模式变化，贸易额逐渐萎缩，以至于“十五六世纪的世界，一个人口近亿，在全球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占第一位、GDP 也占首位的大国，其进出口贸易基本上是在走私贸易中进行，关税接近于零，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竟延续了近二百年”。

生存问题是每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在必要的时候，舍弃发展退而求生存是人之常情。尽管海外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是在面对东南沿海地区饱受倭寇、海盗及敌对势力侵扰的情况时，感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中国政府放弃海外贸易的红利而寻求安全的举动也十分合理。例如在一战之前，英国和德国都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当德国开始威胁低地国家安全的时候，感到危险的英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对德宣战。

因此，长期遭受严重外部威胁的中国，在应用了多年“山川”型陆权发展模式之后，结合实际情况，于明清之际形成了一个更加成熟的“山川”格局：“山”包括北方长城、东南海疆和西南高山密林，“川”则是整个中国内陆地区。这种格局下的中国是一个外部极度封闭、内部十分广阔的帝国，可以在几乎不与外界进行互动的情况下自给自足，而且具有强大的内生逻辑与自洽性，只有更为强大的外力才可以打破这种极端重陆轻海而又排他的发展模式怪圈。

4. “海陆并举”观念的崭露头角

“山川”型陆权发展模式演化到最后几乎等同于完全舍弃了海洋，并且国家反而可以正常地运转；而且这个时候恰逢明清之际，古代中国发展的顶峰，很难想象一个拥有如此漫长海岸线的大帝国可以如此“合理”地与海洋绝缘，因此在这里不得不提及海洋对于古代中国的意义。

海洋对于人类而言，大约有三重身份：陆地尽头的边界，连接陆地的通道，以及鱼盐之利。其中，如何利用海洋的通道属性，是判断海洋型国家的关键。因为海洋型国家将海上贸易作为立国之本，所以必然会积极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沟通，进而更具有冒险精神、更加开放，也就更有可能取得进步。相比之下，古代中国是大陆型国家，以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官方的态度一直是重农抑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民间都是参与海外贸易的主体。甚至在明清两代，政府实行海禁，“片板不得下海”，所以彼时走私贸易构成了中国海外贸易的主体。

按理来说，即使政府不鼓励海外贸易，也没有理由厉行禁止民间的贸易往来。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大陆型国家，海外贸易的利好远不能抵消开放沿海地区可能遭受的安全风险，问题还是回到了最根本的国家安全层面；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中国其实也遭受了一种隐形的“财富诅咒”，因为古代中国属于高度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对于海外贸易的需求并非十分强烈。这种“天朝物产丰饶无所不有”的优势一方面为中国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大大提高了遭遇突发情况时的容错率，但同时也断送了中央王朝寻求变革或者说海外贸易的动力，毕竟只要维持现状就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安全风险。

伴随着中国陆海观念中重陆轻海的程度达到了极点，古代中华文明也借助“山川”型陆权发展模式达到了其最后一个高峰——康乾盛世。但是在乾隆皇帝去世短短几十年之后，这个古老的大陆型国家就遭受了自己曾经轻贱的海洋的反噬：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名为英吉利的岛国从海上叩开了“关”，开启了中国近代百余年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事实证明，古代中国陆海背离的观念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在数千年来重陆轻海的思维惯性的作用下，古代中国最终没能逃离陆权发展模式的舒适区，在远离海洋的闭关自守中逐渐被进步与发展的世界大潮所淹没，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生产力、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远超市人的西方列强打开了国门，勿谓言之不预也。

但是，虽然中国被迫开放了通商口岸，数千年形成的陆海观念却不是朝夕之间就能改变的。一方面，西北内陆的防务压力并没有减轻，以沙皇俄国为代表的陆上外敌依然是中国最棘手的威胁。晚清朝堂上的“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结果是近乎废话的“海陆并举”，但从左宗棠带兵收复新疆的举动就能够看出，“塞防”的优先级依然并且应当在“海防”之上，重陆轻海也是中国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只要中国还处于专制王权的统治之下，中国的陆海观念就将永远是保守的重陆轻海，中国的发展模式就将永远跳不出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自闭式道路。

因此，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才开始彻底摆脱传统陆海观念的思维定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能够以一个开放的姿态面向大海，拥抱世界。“冷战后，科恩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一股强大的海洋经济和海洋导向已经嫁接在封闭的大陆型中国政治之上，虽然中国整体上仍是大陆国



家，但中国的南部、东部和中原沿海地区长期对外开放，深受外部世界的影响。”^①

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之一，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更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劳工和货物的自由流通。中国与全世界的命运也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提倡各国互相包容、和谐共生，甚至还成为了世界经济中呼吁坚持自由贸易、降低关税壁垒的话事人——这与百余年前“遗世而独立”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中国的陆海观念从重陆轻海演变为海陆并举，中国也跳出了封闭落后的陆权型国家的藩篱，寻求建设开放先进的陆海复合型大国。

5. 结论

纵观数千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我们能够看到，对海洋的不同态度是区分古今中国的重要依据。中国陆海观念的演变也比较简单，即古代中国重陆轻海，现代中国海陆并举。在这两种陆海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分别成长为重陆轻海的陆权国家和海陆并举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令人在意的是，两个中国在东亚地区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对地区事务和国际秩序都有着直接甚至根本的影响，而且两种影响——重陆轻海观念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影响和海陆并举观念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影响——可谓相去甚远，中国陆海观念的演变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影响可见一斑。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封建大帝国，与周边各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儒家文化在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因而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以封贡制度为交往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天朝大国与藩属之间的封建关系。”^②东亚封贡体系是“一种迥异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组合”，^③我们可以将其认为是中国式的文化国际主义，或者称之为“文化天下主义”。它“与西方积极的世界主义不同，它是一种消极的世界主义，是以文化教化而非暴力征服来整合天下，吸引周边向中心区域靠拢，内聚成紧密的文明共同体，”^④“从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中国的和平战略文化”。^⑤东亚封贡体系在东亚世界维持了一种“冷和平”（cold-peace）的状态，中国作为东亚国际秩序的绝对核心，一直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原则，除了几个“不征之国”以外，体系内的其他国家只要愿意认同中国为宗主国就可以免于军事征服，至于体系之外的国家，中国既无兴趣也不了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里也提到“尽管中国人拥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和海军，要征服邻邦轻而易举，但皇帝和人民都不曾考虑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客观上讲，中国所谓的“中原十八行省”之外的土地几乎没有耕作价值，无法受到农耕民族的重视，例如长城就是大致按照 200 毫米等降水量线建造的。虽然中国在与游牧民族政权对抗的过程中逐渐扩张了国土面积，可是这种“防御性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战略缓冲空间。可以看到，东亚封贡体系的完善与“山川”型陆权发展模式几乎的饱和是同步的，作为大陆型国家的中国在小农经济能够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失去了对外扩张的动力，同时一直保持着维护国家安全的警惕心理，因此选择了“最优解”即闭关锁国，最终造就了东亚封贡体系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东亚国际秩序。这种秩序无疑是僵化的、不利于东亚地区发展的，处于这种秩序下的中国与其他国家逐渐在“维持现状”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衰落，最终与古代中国重陆轻海的陆海观念一起瓦解。因此，“中国古代的这种‘文化国际主义’虽然有其历史合理性和道德美感，但毕竟是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下的对外关系，特别是等级森严的礼制秩序不适宜与现代社会对接，同时其也不符合主权国家体系和原则。”^⑥

可以说，中国陆海观念的演变，不仅意味着自身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决定了同时期地缘政治与战略思想乃至世界观的改变。身处重陆轻海的陆海观影响下的古代中国，利玛窦也发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存在着致命的畸形。中国的幅员如此辽阔，边界线如此悠远绵长，但他们却严重缺乏认知和见识，对天朝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以至于人人都认为，天朝上国无奇不有。“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正如他所指出：“中国人声称并且相信，中国的国土包罗整个的世界。”正是这种中国中心论导致了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全无了解却如此彻底，以致中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而对绝大多数外国，“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据他观察，

^① 胡莹：《地理空间与全球霸权：布热津斯基地缘政治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0 页。

^② 刘德斌：《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 页。

^③ 刘德斌：《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 页。

^④ 郭树勇：《文化国际主义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9 期，第 118 页。

^⑤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177 页；郭树勇：《中国软实力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2 页。

^⑥ 郭树勇：《文化国际主义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9 期，第 119 页。



“与他们国家（指明帝国）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鸦片战争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在实际上瓦解了东亚封贡体系。事实上，整个东亚地区都开始陷入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状态，直到二战结束、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东亚才逐渐形成如今的国际秩序。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开始真正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因此摒弃了陈旧的陆海观念，建设陆海复合型国家，海陆并举。

随着各个民族国家被侵略、殖民以及在二战后纷纷独立与发展，东亚地区原本的国际格局被重新洗牌，主要国家间的实力对比相对均衡，再加上有域外大国的干预，如今东亚地区呈现出均势型的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秩序。而这一次，中国反而成为了打破东亚国际秩序僵局的“破壁人”。列强的入侵彻底动摇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根基，受数千年发展路径惯性的影响，中国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破而复立的艰难转型。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彻底地从重陆轻海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之前的被迫开埠、五口通商向面朝大海、融入世界转变。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人不仅切身体会到自由贸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等等国家市场运行原则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各国各地区之间协商合作、利益共享、责任分担的必要性。^①因此，在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贸易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这样一个体量无限接近曾经的东亚共主的中国并没有“王者归来”，反而能够主动以一个平等的姿态来与周边国家相处，以一个包容的态度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日、中韩关系正常化），化解矛盾或是搁置争议（如南海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在穿越海洋、拥抱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该如何发展，而且还立足国情、脚踏实地地提出要建设陆海复合型国家，这体现了中国陆海观念的彻底转变。“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也代表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秩序的“隐形守护者”，与各国一道共同维护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繁荣与发展、和平与稳定。

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同，导致影响世界的结果也千差万别。在摒弃重陆轻海观念、转向海陆并举观念的过程中，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在重新融入世界的过程中终于能够摆脱原本的东亚“共主”的心态，转而以平等的身份与周边国家交流相处，积极参与到地区事务中来，在处理领土争端（如南海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推动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今，中国海外看世界的视野更加开阔，包容世界的胸怀也愈发广大。海洋早已不再是人类之间相互交流的阻碍，而是联结全世界的巨大纽带，在新时代陆海观念指引下的中国深谙“天堑变通途”的道理，并且以陆海复合型大国的身份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维护东亚国际秩序的繁荣与稳定，同时也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争取早日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6. 参考文献: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1, pp. 238-244.

胡莹:《地理空间与全球霸权:布热津斯基地缘政治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刘德斌:《国际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郭树勇:《文化国际主义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9 期。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郭树勇:《中国软实力战略》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2 年版。

^① 江宁康:《天下与帝国:中美民族主体性比较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 页。